



5.12汶川大地震摘录文集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长青文献图书馆



前言.....	1
《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 40 年与新征程系列专访合集》	
专访郭虹：做公益永远让人年轻.....	3
《灾区行 汶川大地震 1 周年灾区群众访谈录》	
地震带走母亲，尿毒症突袭儿子.....	7
心中桃树种，遍地桃花开.....	12
《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暨灾后社区重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讨会会议资料》	
社区重建中 NGO 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的能力研究——以北川 F 乡重建中的社工 NGO 为例.....	16
发挥社工专业优势，促进汶川恢复重建.....	33
《5. 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乐施会对汶川地震的紧急人道救援.....	42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45
给 5.12 地震灾区四川省的慰问信.....	47
灾后重建.....	48
工作原则和理念.....	53
附录：长青文献图书馆 512 汶川地震相关书单	55

前言

5·12 汶川地震(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又称“汶川大地震”,发生于北京时间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4 秒,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北纬 31.0°、东经 103.4°)。

根据中国地震局修订后的数据,5·12 汶川地震的面波震级为 8.0 级。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数据,5·12 汶川地震的地震波确认共环绕了地球 6 圈。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国内北至内蒙古,东至上海,西至西藏,南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均有震感,中国之外的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等国均有震感。

5·12 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约 50 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 10 个县(市),较重灾区共 41 个县(市),一般灾区共 186 个县(市)。截至 2008 年 9 月 25 日,5·12 汶川地震共计造成 69227 人遇难、17923 人失踪、374643 人不同程度受伤、1993.03 万人失去住所,受灾总人口达 4625.6 万人。截至 2008 年 9 月,5·12 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451.4 亿元。5·12 汶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2009 年 3 月 2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自 2009 年起,每年 5 月 12 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长青文献图书馆深感防灾减灾的重要性,故根据现有特色馆藏之一——公益慈善行业各机构的资料,精心筛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集结成册,从不同视角,不同时间点回顾历史,愿与业界同仁一道集合多重力量,为提升社会组织全流程防灾减灾专

业能力贡献一份力量。

以下文章分别摘自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和长青文献图书馆联合出品的《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 40 年与新征程系列专访合集》、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编制的《灾区行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灾区群众访谈录》、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主办的《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暨灾后社区重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讨会》汇编内容和香港乐施会出品的《5. 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在此特对以上机构表示衷心感谢。

专访郭虹：做公益永远让人年轻

本篇摘自《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 40 年与新征程系列专访合集》

郭虹，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访谈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CFF:今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之前王名老师在接受专访时也提到，他在 5.12 地震之后到灾区考察时，意外在废墟下面发现很多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农村基金会的档案，当时在农村存在大量以基金会为名的组织。当然，时空背景不一样，这两类组织的本质也不一样。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您对于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观察？

郭虹:我当年挂职下派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农村基金会。那个时候的基金会跟现在的基金会完全是两码事，那些基金会实际上是政府用来“聚财”的，它只做经济，完全不做公益，跟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基金差不多，纯粹是聚财的。所以我觉得这和现在的社区基金会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忽略不提。

我们今天提的社区基金会，国内最早的应该是千禾，然后是蛇口。蛇口基金会从一开始筹备成立，我就介入了。招商局的黄奕请我过去跟他们的发起人谈一谈什么是 NGO，为什么要有 NGO。可以说，我一直看着这家基金会成长起来，一直在关注他们。我自己在武侯讲，我们想成立的基金会，理想状态就是蛇口基金会那样的。但是不可能做到。为什么？蛇口是 1000 人、一人出 1000 元成立，真的是民间的

组织。当然也有千禾这种，由企业家们或者是爱心人士创立的基金会，是推动一定区域内公益事业的基金会。

武侯不一样，武侯是政府决策成立的。成都现在一共有 7 家社区基金会，除了麓湖以外，都是政府背景。虽然是企业家出钱，国资、民资各方面都投入资金，但背后是政府。如果没有政府，这些人不可能出钱。所以，我们今天的社区基金会到底能做什么？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如果社区基金会没有公共性，没有政社分开的话，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这里还有一个关联词，就是社区基金，也算是成都的一个创造。上海、杭州也有，在一些基金会的底下，用专项的名义鼓励社区建立自己的基金。这些基金，有一些能真正发挥作用，比如村里每年给老人们进行慰老助老的服务；但多数基金还是行政性的，不是基于需求产生的。

你去做调查就会发现，活跃的基金，不断有钱进有钱出，多半都是民间的，是村里和家族性的。外出打工的人，每年回来往基金里丢一笔钱，大家投一笔钱，就跟过去宗祠一样，到年底这笔钱再花出去，请大家吃一顿饭，至少这笔钱是在使用和循环的。而多数由行政命令成立的基金会，基本上很难用钱。他们资金很少，一次就用完了。5 万、10 万，对于政府来说就是做了一个活动。我记得最小的基金 5000 块钱都有，这么点钱能干什么？而且谁都不敢用，不敢用就放在那，没有起到基金会的作用。社区基金会到底能够在基层治理中起到什么作用？我还在观察。因为现在的基层治理跟过去提的基层群众自治不

一样。过去我们讲基层治理就是讲基层群众自治，跟政府行政管理不一样，所以民间要有自己的资金池，要有自己的金库。现在的基层治理把乡镇政府都加进来，基层政权也在这里面，而且基层政权还得要有财权，要有国库转移支付。我现在对社区基金会是持观望的态度，不会寄予厚望，特别对于今后再成立的社区基金会，我也不指望它们能够在短时间里干成什么事。

CFF:分开本身是为了更好的协同，有的时候纠缠在一起，反而各自该有的作用都发挥不好。说到协同，在您参与编著的《NGO 参与汶川地震过渡安置研究》中，强调了 NGO 在支持和服从政府安排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从民间力量的角度对政府工作进行有力的协作与补充，扮演好执行者、催化剂或伙伴的角色。社会组织通过协同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管理。您认为未来几年，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上会有怎样的发展或变化？

郭虹:当时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法规性文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其中强调重建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做协助支持和协同助力都是把自己摆在伙伴的位置。当时编著《NGO 参与汶川地震过渡安置研究》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在 512 十周年的时候，我又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十周年的回顾，那时就深刻地感受到，“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是 512 救灾给我留下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政策产物。很多政府的工作当中，都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方针，民政部和各个部门的很多文件，卫生部对于艾滋病的防范，还有扶贫攻坚等方面中央都专门发了文件鼓励社

会参与。

政府主导是必须的因为政府掌握着国家资产和资源，而社会参与的“社会”到底指的是什么？站在政府的角度，可以跟群团合作，也可以找企业来做跟社会产品相关的事务，不一定非要找社会组织来做的。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态度，是从视而不见，变得越来越重视。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对社会组织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

那么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什么？做社会学的都明白，社会组织最重要的作用其实不是服务，协作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倡导和发声。在512的时候，社会组织没有过多地强调倡导者的身份，因为当时条件特殊。但今天再提到社会组织，就不能忘掉倡导这一使命。没有倡导的使命，社会组织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这是不符合“组织”初衷的。所以在社会组织发声方面今后要更加强调。前年，高小贤说过“发出西部声音，总结西部经验”。我们不能忽略也不能忘掉发声的重要性。基金会仅仅是做项目和服务是不行的，现在基金会能做具体服务的对象越来越少了。只对于少数群体做服务，基金会的公共性和普惠性是体现不出来的。只有当基金会为他们的服务对象发声的时候，基金会的意义才会体现出来。

地震带走母亲，尿毒症突袭儿子

本篇摘自《灾区行 汶川大地震 1 周年灾区群众访谈录》

时间：2009 年 6 月 30 日 地址：什邡市洛水镇

受访人：张华举（60 岁）、代礼容（52 岁）夫妇 访谈人：李黎

洛水镇最大的板房区大中华板房区，因志愿者融入，有了温热的氛围。四家来自不同地方的民间组织长驻于此，抱定同一个梦想，耐心地培育着社区生态。省外的复兴工作室免费提供重建房的设计方案，省内的 NGO 备灾中心开展十字绣技能培训，本土的什邡义工用网友捐赠的图书建起了图书室，还有来自台湾、名满天下的慈济基金会，在出钱修学校的同时，也开办静修课、介绍垃圾回收的新理念。建在板房区最北面的慈济活动中心，除了每月更换一批台湾志工，还有 20 多位当地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轮换维护。每周三和周六是代礼容值班的日子，这个时候，她就要同其他值班的志工一起，做好早饭和午饭，让每一位来访者都可以分享。

代礼容总是心事重重，脸色不好看，引起从台湾过来的师姐的注意。后者仔细询问，代礼容谈起了身患尿毒症的儿子——今年 27 岁，刚准备结婚，命运却来了一个大转弯，不但婚结不成了，未来的生活还将在每天四次的腹膜透析中度过；老两口靠退休金维持，每天平均 200 多元的医疗费，更是一笔重负。

师姐记下了她的情况，传回慈济在台湾花莲的总部，但表示只能尽力而为。因为等待救济的人实在太多，这一列队伍不知道有多长。社区里的好心人也在行动，他们挨家挨户走遍三个板房区，募集到了 1 万多元的善款。NGO 备灾中心搭建的收费浴室，洗一次 3 元钱，社

区决定分配给这家子看守，收入虽然微薄，但总比没有强。

代礼容说：“住在旁边板房的邻居，觉得我们这家多造孽多凄惨的，种的菜，时不时都给我们拿点来。就像慈济提倡的，行善事，做好事，尽量帮别人。”丈夫张华举的感激之情则溢于言表：“我们都是洛水土生土长的人，周围的人都认识。这次大家对我们这么照顾，真的是相当感谢。”

问：你们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有多少？

张华举：我以前在化肥厂工作，2000年破产之后，每个月领228元，去年初涨到400多，现在领525元的最低生活费。我爱人是洛水卫生院的退休职工，每个月1290元。说老实话，娃儿不生病，我们这个家庭相比之下还是过得去，我也不打牌。但有了这个病之后，不吃不喝还不够给他医10天。他是今年过年期间查出来的，2月份到3月份又在成都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花了3万块钱，这些钱大都是单位和亲戚支持的。

代礼容：儿子本来准备今年4月14日他的生日这天结婚，一个亲戚把什邡多出来的一套房子给他们做了新房。我们有个10年期的1.3万的保险，退了8660元，然后又借了1万多元，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到现在账还没还完。两个人在一起两年了，感情很好，谁知道发生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也不可能和人家结婚了，除非以后出现奇迹。

问：儿子的工作呢？

代礼容：他去年10月刚和一家私人机械厂签了合同，签的两年，

工资少得很，不过厂里给他买的保险这次还是用上了一些，两年之后我们还要接着买保险。工作现在也不能做了，平时就让他去看一下浴室。这段时间洗的人不多，前天一个人都没有，昨天有六个人。

这个病确实残忍，现在他身体差，高蛋白的又都不能吃，每天低盐素食，肉不超过 2 两，盐不超过 3 克。屋子必须打扫得很干净，防止腹膜感染。这几天他又全身发痒，长水痘一样的东西，把头皮都抠破了，今天我才把枕套洗了。就像照顾婴儿一样。

张华举：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这样吃不得，那样吃不得，思想压力还是大。现在我们都住这一间板房，晚上经常听见他睡在床上哭。但是又没办法，在一天就要给他医一天。要不然就换肾。我们打算把自己的肾捐给他，但是医生说我们的肾都老了，换也没用。现在换一个肾需要三十四万，每年还要吃几万块钱的药，这笔费用无法承担。

问：重建补助金可以不用于修房，取出来给儿子治病吗？

代礼容：可以，前天都开会了。3 个人一户的，补助 2.6 万，但每户要先缴 5000 元才拿，也就是说拿 2.1 万。政府统一规划统一修，然后购买，如果不买的话可以取出来。我们只有取出来医病，不可能买，以后就去住那个准备用来结婚的房子。说实话，政府还是尽量在照顾我们，让我们写个申请，办个低保。现在申请已经交上去了，还没批下来。现在我也学邻居把门口这块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点上豆豆，减轻一点负担。

问：你们家在地震中损失了多少？

张华举：我家住的是洛水卫生院的老房子，属于集体所有，每个月

给 20 多块钱的租金。地震把房子震斜了，我们住的五楼崩开了。地震之后我还上去过，但门卡住了打不开，又不敢去蹬，所有东西都没拿出来。去年 5 月 29 日，这栋楼是洛水第一个爆破的，我们的家具、两个电视、洗衣机、DVD、音箱，都一起爆破了。现在板房里面这些沙发、床、茶几、柜子，都是到处去捡的，别人给的。

代礼容：我妈当时也住在洛水街上。她住那个楼房主楼没垮，单单厕所那一顺垮下来。她恰好就在厕所里，被埋在下面。国家补助了 5000 元，兄弟姊妹拿了些，我们拿了 1500 元，用这个钱买了个电视机，买了个风扇。

问：找过什邡电视台吗，请它们帮忙募捐？

代礼容：社区的人也这么提过，但我觉得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家捐的钱还可以支持一阵子。

张华举：这次到成都去住院，才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先到华西医院去，然后去的省医院肾病中心，病床全部是满的。最后还是托在成都工作的侄女的一个朋友的老公，找到肾病中心主任，不知道怎样说了一阵，才给我们腾出来一个铺。化验也要排队，我们 2 月 5 号去的，有一项动态心电要 16 号才轮得上检查。那些病人确实很造孽，几岁的，10 多岁的，还有吃减肥药吃出这个病的。一般的家庭，医半年就要医得倾家荡产，但又不可能不医。茂县的一个女子，怀上娃儿七个月查出的尿毒症，突然遇上地震出不来，病就拖久了，又染上了结核。我们从成都回来没多久她就去世了，还给我们来了电话。因为当时我们看着他们确实可怜，社区给我们捐的钱，也给他们拿了

500。她那个女儿1岁多，确实很造孽。

还有个同病房的年轻人，射洪的，父亲死了，妈是农村的，家里还有六亩田要管，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他也没钱租病床，就弄了个板板床，丢了一床很薄的棉絮在上面，枕头都没有，一晚上9元钱。所以我有时候就劝爱人，你说你儿子小，还有更小的，你说你年纪大，还有年纪更大的。比我们造孽的人也多。

（单边采访，仅供参考）

心中桃树种，遍地桃花开

本篇摘自《灾区行 汶川大地震1周年灾区群众访谈录》

时间：2009年8月3日 地址：甘肃省文县范坝乡白皂村

受访人：范其松 访谈人：刘佳

桃树，不仅是白皂村村民日思夜想的致富之路，更寄托着全村人的希望。桃树不仅象征着百姓灾后重建的决心，更寄托着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的理想。桃树是一种精神，也是一个人，他正用自己的勤劳、朴实和理想感动着全村 203 户，738 位乡亲。范其松，男，24 岁，甘肃省文县范坝乡白皂村村民，初中学历，地震前一直在广东省惠州市一家工厂打工，并得到经理赏识在工厂学习管理工作。

问：你地震后是什么时候回到家的，听说你在你们村做基金会的志愿者，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志愿者呢？

范其松：我是地震后 5 月 17 日到家的，后来再没有出去过，一直帮着亲戚朋友拆房子。8 月他们云南 PRA 文县项目办的马存俊到我们村子，说要在我们村子上找个志愿者，由于我年轻、在外面经历多些，就被大家推荐上去。当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而且他们说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我想反正也给村上的百姓做点好事，我就一口答应了。我是白皂村社区发展基金组的小组长，我们组有三个，我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我主要是负责给他们基金会找我们社区的资料，看看钱是不是用到位了，联系乡上和村上干部啥的。

问：那从你做志愿者到现在都为村子做了哪些事呢？

范其松：他们基金会给我们村子的钱主要是小额贷款、修路、建饮用水管道还有建小学，我也主要是为这几件事跑。基金会给我们村上数，我也就是尽力把这笔钱用好，给最需要的人吧；修路其实最难了，

5万块的小额贷款，但是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前一阵子主要是忙我们村子在山上，路不好修，成本高不说，关键还要占人家的地，这几着协调这件事。说实在的挺难办的，人家一心办好事，这我们心里也有天就在统计征地赔偿的事，为了这件事也得罪了有些人，现在大队上出了个赔偿的数目，我现在就在统计各家各户的赔钱数；小学呢，现在还问：哦，看来你工作中遇到了些困难啊，都有哪些呢？你是怎样看没修，估计过几天要忙着建小学的事呢。

问：那你能具体谈谈你找乡上的经历吗？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困难吗？

范其松：希望他们帮帮忙那就是建房子了，我们这个村子没有贷款，大家都修不起。本身说好有贷款的，我们把地基都打下去了，现在贷款不给，我们大家都到乡上去找，我也去了几次，他们前些天说等几天再说，后来拖不下去了就不见我们，最近我又去了人家又说没有贷款了，有问题找信用社，信用社说去问政府。大家现在自己的房子都没办法管，哪里还会管我做的事呢，有些人知道是为村子办事，还是很配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我没事找事，嫌在村子里搞的乱。我在外面工作，见得些，思想进步些，知道这是为大家好，可人家不这么想，有些人还说我拿了人家的钱，真不知道是从哪里说的，所以修路建学校也挺有难度，其他的都是些小问题。

问：那你帮着村子建学校乡上支持吗？你又是怎么和他们打交道的？

范其松：这几天一直在跑修学校的事情，讲道理一直想尽快上学，

找文县教委他们，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指标，我说不可能吧，我就不信，我就每天给他们打电话，想让他们把指标给我们，就相当于为民请愿吧。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去找我哥，我哥在文县教委，他给我们争过来一个指标，还答应给我们配老师，现在算是大体有了头绪，他们基金会很感谢我，说我很执着，我说这是在为我们自己办事嘛，可是村干部却认为我多管闲事，说现在路还没修好，搞什么。我说这学校又不是要给我修的，我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现在大家都希望赶紧修好学校，你们却一点事都不管。后来建学校大家要抽工，我和大队干部说给大家开个村民大会商量一下，他们还是懒得动，我现在也是没什么办法了。我们这里的人天生就是等靠要，我就和他们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争取，自己要努力。

问：那你希望将来我们村子是什么样的呢？

范其松：其实也很简单，我就想让自己的村子有路走，娃娃有地方上学，大家不用再靠天吃饭就行了。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先把房子修起来，然后再看看有什么能发展的。

问：那你以后打算要做些什么事呢？

范其松：想法当然有。我觉得我们这里气候好，阳光好，土壤在全乡也算数一数二的，我一直打算鼓励大家都来种桃树，种麦子收成不怎样，听说种桃树大家有钱赚，这样也算发展经济了。但是现在还想不到那么多，主要是先把路修好，把小学建好了，然后我再去外面跑一跑，我在外面也认识些人，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我这里搞些投资，帮我们把桃树种上，我们这里确实很适合种这个。我们大家再出点钱，

等乡上的路修好了，我还打算在这里开个加工厂，大家就不用出去打工了，在这里就可以致富。

（单边采访，仅供参考）

社区重建中 NGO 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的能力研究

——以北川 F 乡重建中的社工 NGO 为例

本篇摘自《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暨灾后社区重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会议资料》

罗观翠 柯毅萍

灾后重建必须多面向进行，包含住宅与社区环境重建、生活机能复原、产业复兴、心灵创伤的抚慰等，其中住宅与社区复原是重建工作的首要项目，而迅速优质的社区重建成果需依赖整体而适合的社区重建规划。虽然有些地区能够迅速地完成重建规划，但部分地区重建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忽视居民需求与地方特性，造成规划可能对重建区无法发挥实质效益以及整体重建时程延后等。在灾害发生频率与灾害损失逐渐升高的趋势下，政府部门在灾后重建阶段面对资源的限制、资源配置公平及效率的问题下，往往需要民间组织支援重建所需的专业人力、财力或物力，减轻政府部门负担，及作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使重建能够符合民众需求。事实上，从大灾发生的那一刻起，很多 NGO 都参与了救灾和重建工作。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一些 NGO 逐步撤出了灾区，另外一些则转换了自身的工作重心，选取了与政府工作有所不同的侧重点，为灾区重建提供更为个性化、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在灾区重建整体任务行将完成之际，非常有必要对重建进行思考，因为这是当地第一次利用灾害作为发展的机会开展认真而又规模巨大的重建活动，而重建中良好的意图和努力在经受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考验之际，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以及建立公民社会等相关议题面临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一、社区重建及其问题反思

F 乡位于北川县东南面，地处龙门山断裂带。距北川老县城曲山

镇 19 公里。属于极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全乡有 15 个村的道路完全被毁，全乡阳山 95% 的山体发生垮塌和泥石流，河床平均抬高 10 米左右，形成 100 多个地质灾害滑坡点。全乡 18 个村中共有 14 个村的 69 个村民小组 8000 余人受灾严重，46 个村民小组整体被毁，完全无法居住。由于山林、土地、房屋损毁严重，重建的任务异常艰巨，山东省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青岛市安排为它的对口援建城市。

（一）重建过程中政府和民众的矛盾

在紧急救灾阶段过后，F 乡立即转入灾后的评估和社区调查、制定重建规划阶段。但和救灾阶段相同，整个重建过程仍然是以政府行政命令为主导，政府和规划部门以及承包商是重建任务的主要提出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从项目立项、方案设计到建设实施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在这个封闭系统中运作，民众被排除在决策系统之外。虽然在某些阶段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众参与，但这仅仅是政府在进行宣传和教育，民众并不占有完全信息，也没有实质的决策权，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因而当地的规划方案一改再改，村民不断被要求按照更改后的规划重新安置，从帐篷到板房再到临时搭建的过渡房，很多家庭挪动他们的家多达七、八次。

及至 2008 年 12 月，当地的重建规划图和总体规划方案出来后，政府仅采用告知，村民不知道或不了解展览内容；二来专业的配置图、平面图无法让一般村民形式化的宣传方式，例如广播和宣传板块，规划图展示等。一来没有专门介绍和让村民充分了解规划内容，以致规划后执行的施工阶段，村民仍然不了解规划的细则；二来村民缺乏参与经验，

个性保守，在宣传成为重建造势的手段，号召大家自立重建参加攻坚战的情况下，变成人人知道重建却不清楚规划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着各自的生活。

在住房建设的规划、设计和承包阶段，政府没有调查村民的住房重建需求和意愿，包括居住面积、住房形态、经济负担能力等基本需求。村民也没有组织代表与专家或政府协商重建规划，只要在政府规划新建区内的住房，就必须采取统规统建的方式，交由政府招标的承包商建设。而在征地工作耗时半年不能完成的情况下，迫于整体重建任务的体制性压力和政府重建工作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要求，住房建设工作被紧急启动并快速推进。按政府的部署，统建房从开建起要在3个月时间内完工，各村统建点规划鸟瞰图上写着的工期全部是“71天”或“89”天，保证2010年春节前入住。如此赶工，当村民们发现有质量问题，向包工头反映无效后，要求工程监理和政府给予解决，但几经交手，个别严重的问题政府始终没有及时的正面处理。村民们于是联络了香港《明报》和国内的一些媒体到当地采访，对统建住房中的问题进行曝光。但政府仍然采取“灭火”式的对策，不是认真与村民沟通，协商出办法，而是要求村民接受政府的整改意见。由政府请来工程队，在对问题建筑进行简单施工后，工程停摆数月，双方僵持持续着。

（二）社区重建的行政化

F乡的个案呈现一个行政主导重建，排斥民众参与的重建机制。政府这种“垄断式”的灾后重建模式，在缺乏相应人力、物力和信息资

源条件下，必然导致灾后重建工作上的“力不从心”，既无法迅速恢复受灾地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也会引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在 F 乡，这些困境的现实反映就是资源（资金、物资、板房、帐篷等）配置的不公平、补偿政策的缺失、盲目拆迁、“豆腐渣工程”等等。作为政府领域之外的两大领域——市场领域和公民社会领域，以及这两大领域对应的能动主体企业和公民（村委会、居委会、NGO）理应弥补政府的缺陷。但事实证明，市场机制内在的利益驱动逻辑与灾后重建的“奉献”逻辑存在一定的冲突。面对市场机制的公共危机治理失灵，政府的介入自然十分必要。但政府的介入却缺乏一个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政府自身干预意愿、监督能力成为制约因素。西方的治理理论提供了跳出“二维悖谬”的思路，提出应该凭借公民社会的力量化解上述困境。而公民社会力量的发挥依赖于其集体行动的能力，我国公民却是“原子化”的个人，集体行动的能力很弱。因此，需要基层社区组织成为公民的组织载体。但是，由于灾难的破坏，这些基层组织的载体结构（环境、场所、人员）遭到破坏需要重建，况且它们原本存在的“附属行政化”顽疾，很难在灾后重建中承担起组织当地民众的责任。尽管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主张公民应当更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但是，政府对民众参与带有怀疑情绪，过往的政府管理实践中也缺乏村民参与的成功案例。

因此，在此次重建的程序中，政府与规划单位在各阶段按自己的工作进度走。在规划设计阶段，缺乏村民参与，随后执行设计方案、施作工程，但村民不认同并抵制住房继续修建，使得规划进度改变。

施工之后，村民参与持续发烧，而建设单位和政府回避与村民沟通、解决问题的策略失败，工程不得不暂停。村民监督施工现场提出的询问意见，本来应该得到重视和部分采纳。反之，不允许村民参与，不建立有效的沟通管道，必然影响工程的进行。质量问题的出现，就在于政府和村干部对村民不信任、不放手，什么都想管，出了问题又有逃避和压制的倾向，使这些简单的情况演变成了敏感的事件。

在灾后重建的背景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忙于应付众多的事务。也许他们也认同民众参与的必要性，但却不会积极倡导或主动邀请民众参与。即便他们让民众参与了，也不会把民众的意见用于行政决策。民众有被隔离于政府决策过程之外的感觉，由此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持续上升。当然，行政化的重建也跟社区参与度不足、社区参与能力弱有关。当我们质疑一个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时确实需要关注背后可能的脉络。对F乡来说，从区位上位于川西北，一直以来就比其它地方面临更严苛的经济困境，发展程度不足也带来当地居民主体性弱、社会文化教育地位低的问题。如果没有地震，也很少外来的机构和组织会关注并扎根在当地进行社会性服务。

（三）社区重建的真实意涵

重建政策制度的设计确实紧密地影响着社区的实践方式与脚步。灾后数百个农村社区藉由政策资源的补助，被牵引到重建这个网络，呈现着多样面貌和多元发展。要处理社区的纷争或扩大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但是政策上以竞争方式鼓励快速重建，就促成了少数有权力的人强势决策的必要性，也阻碍了转化

过程能够缓慢生成的机会。在行政机制的操作之余，社区所面对的问题有没有被深入看见与解读？

重建涉及社区发展的多元议题，规划也层层叠叠，在“面”的部分似乎是都能关照到了，但是因为没有时程的概念，究竟什么样的社区，在什么的阶段，要进行什么样的社区重建工作并不明确。重建快速推进，快到似乎来不及等待社区内部的成长。但是，一个个重建地区的实践过程告诉我们，造社区的时候缺乏“造人”的主轴的重建，将会出现更多的矛盾和更复杂的冲突。F乡的重建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社区重建代表了国家赋权给地方政府，通过资源配置，进行地区发展。而我们的理念，更希望藉由社区重建来重新连结人与环境、改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促使公共性的生成，调整社区里固有的权力结构等比较深层的目标。

应该说，灾后这些社区的重建是诞生于一个民间力量正蓬勃发展、蠢蠢欲动的年代，而国家政府也早就倡导进行社区建设。经过多年的实践，许多地方逐渐展现出多元文化面貌，并藉由多元议题引发居民关心所在的社区，同时，学界与行反省。但是所谓社区重建到底是什么？

民间也透过了反覆的检讨与论辩，对社区问题进行批判或对民间力量不能生长进在进行规模巨大的社区重建时，确实需要检视“何谓社区的主体？”等问题。

有决策权力的政府部分和专家团体，在进行社区规划时是否能自知、自觉自己在社区里占有的结构性位阶与掌有的权力为何，是否明

白社区里不同群体对重建的不同认知，是否尽可能地做到沟通传递的工作，并在决策时能提供其他群体参与的机会？这才是社区重建的深层意涵。

面对上述问题，一个健全有力的社会工作机制对社区来说不无必要。而民间 NGO/NPO 组织的数量与分布逐渐地增多增广，社区的重建，需要仰赖越来越多具备有空间、文化、产业、教育等实务经验的各领域专业者来协助。但是第三部门的组织是否能清楚在社区面临的整体课题之下，各自可以发挥的专长与分工方式，各自的能力以及发挥能力的途径，且在生存的压力、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下还能保有理想性与批判力，才是民间力量能否壮大、持续，以回应甚至影响社区重建的关键因素。

二、NGO 参与社区重建的能力特性

Mileti 在 1983 年曾汇整 14 个重建地区的重建案例，认为民间组织在震灾后的行动能力由三组因素构成：“行动的能力 (ability to act)”、“行动的理由 (reason to act)”以及“知道做什么的知识 (knowledge of what to do)”。Mileti 认为组织的技术能力、可用资源、组织的弹性与适应力、组织的意愿与认知、社区的认知、过去的经验会影响组织在重建工作中能力的发挥（转引自 Rubin and Barbee, 1985）。林水波（1999）认为影响组织能力的因素包括“问题的可处理性”、“相关人士的特性”、“结构的兼容性”、“资源的充足性”、“执行工具的妥当性”。运用在民间组织参与灾后社区重建计划，影响其参与能力的因素概要起来，可划归为简单几项，包括社区重建规划的特质，该组织过去是

否有参与社区重建规划的经验，以及在地居民的配合意愿、政府及其它团体的支持与配合程度等外在环境条件等。

（一）重建规划的特质成为影响组织能力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种规划的性质不同，涉及的规划面积、人口组成等也有所差异，尤其是规划的内容侧重不同，在制定规划和实行规划过程中，各方参与的能力、机会、途径也会有不同。从社区重建的特性来看，一方面是重建规划和重建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房屋的产权问题、土地重划的问题、拆迁安置争议等问题，难度都比较大，另一方面是重建问题的冲击层面：像异地安置、整村迁移，对社区构成的冲击层面较广，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这样，重建规划的性质和各种类型的 NGO 的参与空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像北京“地球村”在彭州大坪乡建设的“乐和家园”，还有清华大学“可持续乡村重建团队”和南都基金会以及台湾谢英俊的“乡村建筑工作室”联合在汶川草坡乡码头村、茂县杨柳村、青川岩捻村等地推行的“协力造屋”模式，正是基于这些组织本身能够开展侧重于住房重建相关领域的工作。

（二）组织的资源条件以及政府的支持程度也是影响 NGO 参与能力的因素。

就实际的社会服务或福利规划来说，NGO 在农村社区设立工作站，不论设立单位为何，是灾后重建中重要的第一线福利服务机构。然而，因设立单位与经费来源的差异，不同 NGO 的使命与工作目标并不全然相同。由政府委托而设立的 NGO，主要以执行政府的灾后重建政策为主；而由 NGO 所筹设的工作中心，除承接政府委托方案

外，在工作目标上，还涉及到 NGO 本身使命的实现。但即便 NGO 本身的规划目的与资源自主性较高，规划所需经费皆以自筹为主，仍然不可能不待政府而自行开展活动。特别是政府在过渡安置阶段中，就开始加强对在灾区的 NGO 的管理，不仅要备案，其开展的活动也要经过当地政府的允许。虽说现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社会权利的成长和国家权力的相对回缩以及乡村社会的自主性日益增强的阶段，但乡村政权和基层干部又处于日常性权力弱化与特殊化权力尤强的状态（赵旭东、辛允星，2010）。自税费改革后持续弱化的基层政权组织，借灾后重建国家对重灾区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权力得以强化，以其权力主导和支配重建决策和运作的冲动就越强，对社会参与的要求更不易认同和支持。NGO 其实需要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支持，也愿意被纳入与其目标相符的政府重建规划中，可以增进其在当地服务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可增加其实现本身目标的机会，但这样的要求却很难得到满足。如果重建地区当地政府的复原政策目标与 NGO 的规划目标相似者，这些 NGO 会提出申请案，以取得政府补助，接受政府委托方案，提供那些政府未能提供的服务给灾民。但目前的情况是，在四川各地，政府部门和 NGO 间很少有这种以契约性形式合作的互补关系。震后初期大量 NGO 投入灾区的救灾和重建工作，但又无适切的资源配置管道，以致有些 NGO 面临断炊的窘境；更可悲的是，有些为了生存只好修正原来的规划，缩小组织的规模或改推出其它较易获得资源的服务项目；有些较弱勢的 NGO 或者一些在灾后新成立的草根 NGO，在经历种种困难后无法生存而消亡。

(三) NGO 本身的经验也是其影响其工作能力的因素。

这次地震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缺乏灾难救援的经验，很多 NGO 似乎角色不定，责任范围也变化无常，往往没有组织自身明确的工作目标、缺乏完整的组织架构。因协调不足，使得某些角色过多 NGO 投入，或投入不适合本身能力所及的责任，比如在灾前一拥而入从事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却由于专业能力不足，在地化不足等制约，工作效果不理想且受到非议。但是进入重建阶段后，留在灾区的 NGO，相对来说，已经渐渐找到各自的工作定位，实行以自己组织特色为主的有针对性的服务类别，比如有些以经济和产业振兴为主，有些以复兴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主，有些以妇女或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扶助为主等。以在 F 乡的启创社会工作站点来说，在当地的社区工作的制定，首先是基于启创介入 F 乡重建时间点的因时因地的需要。由于它在 F 乡建站是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当地的社区重建已经进行一半，征地搬迁等最复杂的工作业已完成，农房重建正处于施工中。在对当地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社区需求评估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放在社区机能的恢复和提升上。其灾后重建阶段推行的计划首先是与其依托的广州启创社会工作协会在最近的几年里一直开展的社会工作有关联，包括养老、家庭关系、青少年发展、学校社会工作、社区服务等。在工作内容与经验的方案有关的基础上，再结合 F 乡当地的社情民情，拟定适合当地的社区社会工作。

三、在地社会工作促进社区重建

就理论上来说，社区的重建和发展有三种主要精神，一是解决社

区居民切身需求问题；二是社区居民必须积极参与；三是居民的自助是社区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这是一个组织与教育民众的过程，需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协调各社区关系、运用社区内外资源、采取社区自助行动，达到引导社区的社会变迁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理念层次上，社工站希望建立一个服务体系和服务输送模式，在灾区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与本土化服务需求的实务运作模式。社工站在当地的定位更趋向于综合性服务为主，与一般社工 NGO 锁定特定人口群为服务对象大相迳庭。社工站服务对象是灾区所有福利需求者，预期达到的功能，在消极面是结合政府与民间资源，主动发掘社区需求，发展各种专业服务方案；在积极面则是要以社区发展的方式，引导社区组织的自主发展，建立社区集体共识，以强化社区问题解在直接服务及微视层面，社工直接提供服务，挖掘及优先介入易受伤害人口决的能力，活化社区自治能量。

组织者等角色；而在宏观层面，社工其实同时承担着开发及协调资源、团队整合、（老人、儿童、障碍者、低社经者等），扮演着咨询者、教育者、使能者、社区倡导志愿服务、倡导相关组织与政策的改变，以及改善组织自身以协助灾难重建功能及发展灾难准备工作。总的来说，启创在当地已经开展和未来致力发展的社区社会工作的类别主要有：（1）社区互助照顾项目。比如透过关怀受灾户及弱势家庭、老人、儿童少年照顾、建立受灾户互助系统、个案探访服务等方式来执行，了解民众的生活情形，如就学、就医、就业及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据以提供明确及时的后续服务。（2）社区居民生活重建项目。

由社工进行家访、安排相关健康、心理康复、妇女发展、残疾人康复等培训课程和工作坊，通过辅导训练等项目，协助灾民恢复灾前原有的社区正常活动，以展现居民正面因应复原的能量，避免长期浸润创伤中。(3) 社区机能恢复项目。除灾后个人家庭本身软硬件修复重建外，社区环境外貌是整体社区精神表征，社区公共空间的修复及公共议题发声的功能更需尽快修复。在这方面，启创链接外来的资源，结合社区公共空间的修复、公共设施软硬件的完善过程，发动社区公共活动，发展社区公共空间。(4) 其它社区自主发展项目。随着灾后重建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不同时期工作内容的适当转变，未来工作焦点还将集中于协助社区进行长期重建，执行方式将更加多元，比如建立社区防灾通报动员体系及课程、社区灾后调查、灾后影音纪录、灾后公共卫生和传统文化倡导等。

启创在当地一年半的社会工作，至少从三个方面促进社区重建的运作。第一，以其较高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参与灾后农村社区重建，在学校重建、社区建设、文化恢复、心理救助、家庭回归、个案关怀、志愿者工作等方面发挥作用；第二，以植根于民间的特殊性吸纳整合社会资源，借助四川本地的社工组织，以及港台地区其它国际 NGO 如宣明会、明爱、苗埔等的资源和经验，共同开展灾后社区重建工作；第三，及时反馈重建需求，成为政府和民众间的沟通者。灾后重建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需求十分巨大，而灾区和受灾群众面临的困难、问题、需求也千差万别，随着时间条件的不同，也会产生需求的变化。驻地社工们长期在第一线与受灾群众进行广泛深入接触，了解真实的

需求，并以社工简报和半年度报告的形式，和地方主管官员交流互动的形式，向政府部门传达民情。但是，由于在当地建站时间较晚，重建前半程中累积的问题一直延续并持续干扰后期开展的部分工作，再加上住房重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社工站在错失初期就介入这一领域的工作后，难以应对由此产生的矛盾。再加上在这些重建领域交杂的与政府、乡村干部和村民间复杂的利益矛盾，政府对社工站工作内容的限定等，社区社会工作在当地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压缩，缺乏更多的参与渠道，许多优势和资源无法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得到高效的利用，制约其功能的发挥。

四、提升 NGO 社区社会工作能力的几个问题

工作参与的实践过程，进行深刻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的困境，有些是现不管怎样，灾后社区重建中，NGO 的参与，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检视其实的体制和制度障碍，有些或许只是作为理念的实践者不得不接受的限制条件，对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需要寻求突破挑战的应对之道。

（一）及早介入重建进程，搭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平台

既然政府部门在重建任务繁重和人力资源限制等条件下，更容易以行政方式强行主导重建过程。相较于政府单位为了达成行政命令而忽略灾区民众的实际需求，NGO 更能够理解灾民的需求及心理变化，以专业者的角色，既能收集各种民意的看法，形成制定政策的助力；又能打通政府和民众间参与的管道，代替政府积极而有耐性地向民众沟通说明。在重建初期，需要向民众解释各种政策规划的内容，了解

民众的需求和反映的阶段，NGO 作为中介，既能与政府进行互动，协助政策推行，又能向民众提供专业协助，将社区的在地需求传达给政府，以使灾后重建在水平互动及公开对话中有效的进行。NGO 透过倡导政府对社区重建的需求及反映社区民众在进行社区重建行动过程中的意见与建议，使政府与民众有一个沟通平台来了解彼此的需求。在灾后重建计划执行中，如果没有 NGO，社区民众及政府将缺少一个过渡、缓冲、润滑及调节的机制。而这种中介角色，介入过程，对 NGO 本身来说，也能提供自身在当地的的存在感，通过关联政府和民众双方，也获得双方的信任，对后续工作的开展起到良好的铺垫作用。

（二）“在地性”服务需要切合重建地的区情

对于外来 NGO 在重建区的活动，也会有一些质疑，包括认为这些机构缺乏对当地人际脉络、文化内容的细致了解分析，难以找到当地的真正问题。确实，区位的限制是 NGO 开展地方工作的一大难题，比如对当地公共议题的深入挖掘，需要社工员花费更长的时间，需要很多的人力投入，同时，对于当地的培训或辅导的课程设计，也需要更周密的计划以吻合地方的需要。有一些难题，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解决，比如，在当地村民已有的地方知识的基础上，用地方习惯和熟悉的语言和文字方式来工作，并更多地提供给他们实务操作的机会参加到活动中来。比如，我们的驻地社工有一半多是来自在四川学习或工作过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工作者的，他们与当地村民的交流和沟通收集到的信息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宝贵资料。但是，在当地的

工作总会有一些困境,除了实际执行社工 NGO 所强调的工作目标外,服务项目林林总总,由于人力结构上的限制,想要执行更多的服务项目的确很难。而且,由于社工站身处民众需求与政府决策之间的矛盾地位,使得社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必须背负民众的期待与来自地方政府决策执行上的为难。

(三) 从多元重建议题出发开展社区工作

社会工作强调的个案、团体、社区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社会工作模式却一直侧重在“个案工作”,这样的思考模式往往当社区居民符合机构认定的“问题标准”时才提供服务,而许多处遇的方式也着重于单一“问题”的解决。但是,放置于福利资源稀缺或者资源难以公平分配的社区,放置在灾后重建的背景下,当整体经济发展和利益矛盾成为社区工作者无法逃避的课题,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却难以应对。这样的转变与过去对于社会工作既定认识框架产生了偏离,社区工作者不仅面临着自我定位“社会工作者到底是什么?”,也面临着“什么是工作者应该关怀的议题?”的问题。如果说,在重建中,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以及住房建设等是社区最深切的需要,社区工作就需要从单纯“问题个案的工作者”转变成“社区整体问题的工作者”。然而,这样的转向却使工作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所谓的重建问题,源起于社区解组,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单单从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这正意味着“社区整体”工作模式的重要与必要。也许在地震之后,因为灾区重建工作,无法仅着眼“单一问题”上,开启 NGO 尝试转向“社区工作”的契机,落实了理想中的可能。

（四）“综合性”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网络连结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以往均针对单一服务对象需求满足为主，设计出合适的服务方案与服务流程。投入重建工作，灾区民众需求不一，社工站立基于原本服务领域为主，再试着发展出符合当地的相关服务方案，此过程对国内实务界而言确实是新的尝试。即便是相当有经验的 NGO 或专家学者，面对灾区不确定需求的情境，仍以“探索性”的心态，设计较能满足灾区民众需求的方案。由于社工站身处民众需求与政府决策之间的矛盾地位，对于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诸如就业或住宅重建等，社工站所能做的，就只是简单性的咨询与辅导，无法提供其它更专业的协助与服务。即使这样，灾区社工人员本身除需具备专业知识与能力外，还需要了解各项政策，以协助民众，解答其困难。在诸如 F 乡这样的偏远山区，社工常常要采取综合性社会工作的模式提供服务，不区分直接或间接服务，或针对儿童、老人、妇女等等，抑或个案、团体、社区等工作方法的区分，强调以案主需求为考量，因应案主问题作评估，提供适切的服务。这样，在灾区的社工就被期待是一个全才，能够落实全方位的服务计划。由于受灾地区幅原广阔，即使只是辐射于一个乡或村的社区，要面对的困难也很多，需要藉由不断修正与借助民间团体的协助。因此，社区重建的挑战还在于如何从个别的社区内部脉络，以及个别社区工作者所发展出来的交流与学习模式，再往上进一层，成为“区域性的工作网络”。因为整个区域在重建中遭遇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和相关性，社区面对的经济、产业、文化、生态、组织等种种议题，不是个别社区内部的个别问题，而是社

会种种问题结构下的产物，与市场、消费、权力、政治等种种结构互相对应。因此，重建的议题需要与社会问题结构连接，需要跨区域合作。

发挥社工专业优势，促进汶川恢复重建

本篇摘自《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暨灾后社区重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会议资料》

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09年11月，在广东援建工作组进驻汶川灾区一年零三个月之

际，因应灾区恢复重建的需要，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县领导达成共识，决定将社会工作纳入重建工作规划。在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由广东工业大学等单位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组建广东社工站，并在县民政局注册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来运作站里的服务，实行“两张牌子一班人马”。我机构为非营利公益性社会组织，为汶川县首家民办社工机构。机构使命是：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使命感，服务汶川民众，进行本土社会服务探索，推动灾区社会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宗旨是以人为本、服务民众、助人自助、温馨和谐。主要业务是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主要工作内容为组织社工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促进震后心理康复，开展孤儿、孤老、孤残等特殊群体服务，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舒缓心理压力，提升民众素质，提供产业结构转型所需要的就业创业支持，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机构现有社工 11 名，在全县建立了服务网络，面向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一年多来，我机构配合汶川恢复重建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发挥了社会工作方面的引领作用。机构已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单位会员，理事长刘静林教授被评为“中国十大社工人物”，总干事周小燕被评为“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被授予“汶川县荣誉市民”，机构 6 名社工被评为“汶川县优秀社工”，我机构团队及其服务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肯定。

一、主要工作及其成效

（一）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实行规范管理

1.科学的组织架构

机构实行理事会下总干事负责制，根据工作职能设立行政部、财务部、项目部、志愿者部和督导部五个部门。同时，机构在总部下设福利中心、绵鹿、映秀、水磨、雁门五个社工站，每个站辐射周边三到四个乡镇，建立起覆盖全汶川的服务网络。

2.完善的制度体系

为了维护社工合法权益，保证工作效率，提高专业服务质量，使机构正常运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对机构人员结构与职位权责、社工权利及义务、人事聘任与解聘、作息制度、考勤管理、社工休假与请假管理、薪资管理、日常工作管理、财务管理、劳动保护、保险及福利待遇管理和奖惩等 12 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3.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

本机构建立了由多个相关领域专家、领导和骨干以及本土力量组成的理事会、顾问团和督导组。如理事会 9 名理事分别由高校和社会服务机构、汶川县民政、工青妇等相关单位骨干组成，他们对机构的重大事项进行研讨和决定，把握机构的发展方向。机构顾问团由 12 名来自政府和教育研究机构的领导和专家组成，为机构建言献策。机构督导组由 8 名来自广东、四川高校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专家和骨干组成，他们对社工实行“一对一”的专业督导，帮助提升社工的服务质量。三大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为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先进的运行机制

机构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行。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政府共同安排援建款的 424 万元作为社会工作的专项资金，由汶川县民政局向我机构购买《汶川县“精神家园建设”社会工作综合服务》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是目前正在广东先行先试的一种新兴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被广东援建工作组引入汶川，成为灾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新型典范。同时，机构获得了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开展羌族儿童和贫困单亲家庭服务。初步建立起多元化的项目来源体制。

（二）加强队伍建设，创新本土化和专业化结合的灾区社会工作服务队伍模式

机构充分发挥专业社工的带动作用，加强培养本土专业人才，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加入灾区重建，创新了“1+1+1+1+N”服务队伍模式，即每个社工站工作团队配备 1 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社工、1 名汶川本地社工（他们一般为非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羌、藏、回、汉族均有）、1 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和若干名汶川本土志愿者。机构注重人才队伍的本土性，尽可能聘用川籍人士，特别注意聘用适量的汶川本地人，机构 11 名社工川籍人士为 9 名、汶川人 7 名。同时注意加强对社工特别是汶川本地社工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每位社工都有专门的督导通过电话、网络、现场等方式提供专业指导，机构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专业培训和学习交流。不断提升团队的服务水平。机构成为多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基地，先后接收了 95 名来自广东工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长沙民政学院等高校社工专家”志愿者服务队和 95 人的“我爱我家”志愿者爱心艺术业

实习生。实现社工联动志愿者，组建了 800 人的“我爱我团”。这有利于本土社工队伍的成长，也有利于机构的持续发展，履行了机构对培养社工人才的责任，发挥社会工作对社会建设的作用等。

（三）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提供优质服务，打造社会服务品牌

机构社工秉承社会工作理念，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入驻社会福利中心，深入社区和农村，活跃在大街小巷和山山寨寨，为民众提供专业服务。如汶川县福利中心社工站社工为入住的 117 位孤老和孤残人员提供贴心服务，对服务对象开展个案辅导，建立手工小组、知识小组、“夕阳红”艺术团，组织服务对象唱歌、跳锅庄、练书法、下棋、打球，开展“一人一故事”小组活动等，组织“快乐圣诞”、“三八送祝福，情暖福利中心”、“爱心老人进社区”等活动。帮助服务对象心理康复和适应新的集体生活。孤老、孤残人员的生活变得充实、快乐起来，福利中心充满了家的温馨。来自福利中心的姚大爷说：“共产党和社工都非常好，共产党让我们吃饱穿暖，社工让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映秀、雁门等四个社工站社工为乡镇民众举办丰富多彩的小组和社区活动。如在萝卜寨开展“礼仪环保、共建家园”志愿服务、“寒假快乐营”系列活动等；在水磨开展“社工驻水磨，佳节赠对联”、“环保礼仪志愿者系列培训”等活动；在草坡乡码头村开展“齐力建家园，拔河迎新春”等社区活动，羌风村民族文化系列活动等；在布瓦村开展“我是羌族人我骄傲”、“舞动人生”等小组活动和社区活动；在映秀开展“亲子运动会”、“青少年快乐假期”、“导游培训”、“妇女自强营能力建设”等活动。来自映秀镇张家

坪村的阿斌（化名），妻儿子女都在地震时遇难，针对这一特殊的情况，社工将他纳入服务对象里，为他链接更多的爱心资源并经常关心他，给予他支持和帮助，在社工的引导下，他还从阴影中走出来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让他在志愿服务中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同时他还积极帮助社区弱势群体链接资源，他的生活变成充实而有意义，他给社工发来手机短信说：“一家人，一起走，我是含泪给你们写信的，谢谢你们能理解和支持我，谢谢！”在服务过程中，机构注重打造服务品牌。目前，机构总部层面形成了“感恩于心，回报于行”大型社区活动、“我爱我家”志愿者队伍建设、“心家园·新风尚”环境适应、高半山羌族儿童社会化社会工作服务等服务品牌。各社工站初步形成自己的服务亮点，如福利中心社工站的“最美夕阳红”系列康乐活动，绵虬社工站的“凤凰浴火、羌禹涅槃”羌禹文化传承，雁门社工站的“快乐伙伴青少年成长计划”学校社会工作，映秀社工站“社工传爱，情暖映秀”行动，水磨社工站的“山水人家”产业结构转型就业创业支持等。机构成立以来，秉承社会工作理念，运用专业方法开展灾区社会工作服务，共开展个案 112 个，小组 43 个，大型社区活动 100 余次，组建了 800 人的“我爱我家”志愿者队伍，服务 5 万人次。机构开展的各项服务民众参与度较高，如来自雁门乡通山村的服务对象赵大哥说：“社工很帮我们灾区人民，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机构服务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广东省副省长肖志恒、国家民政部社工司副司长柳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南

燕等领导的赞赏，汶川县委副书记、县长、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通荣赞誉社工为“在农村和社区播撒爱的种子的使者”。我们的服务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阿坝日报》、《南方日报》、汶川县广电局等众多媒体报道机构服务40余次。我们注意对服务进行探讨，发表了《（汶川）广东社工站成立前后》、《灾区社工机构队伍建设探索》、《灾区社工机构持续发展探索》、《灾区本土志愿者队伍建设探索》、《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社工传爱、情暖映秀”行动的研究》等十余篇研究论文，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

（四）与政府有效沟通，积极促进汶川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参与推动社会工作纳入社会建设内容

机构社工高度的责任感、敬业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服务效果对政府产生一定影响，机构积极参与搭建汶川社会工作平台，推动汶川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发起建立汶川县社会工作者协会。通过社工的努力，为汶川民众谋福利，更为政府分忧。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帮助弱势群体的显著效果，在促进新汶川发展的作用让当地领导和干部看在眼里，县委县政府逐步决定将社会工作纳入到汶川应对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中。通过参与两会等方式以社会工作的视角为汶川的社会建设等工作建言献策。通过提供有效的服务和提供信息等方式，让政府对进一步开展社会工作产生信心和决心。同时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协助政府建立社会工作体系。

二、几点体会

（一）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是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当地政府在机构的注册、办公场地、经费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作为社会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的民政系统也给了机构大量支持。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社会服务机构向我机构派出专业督导，为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汶川县各乡镇和相关部门也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便利。

（二）一个有理想和信念的团队是机构发展的根本。

社会工作是新生事物，灾区社会工作更是一项新的工作，汶川的环境比较艰苦，社工特别是非川籍社工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如远离家乡、饮食不适、语言难懂等。为灾区民众做好服务的理想和信念是我们团队能够坚持和超越与突破的支撑力量。如柳司长在我机构的题词中写到：“发展社会工作，需要愿景牵引，需要信念支撑，需要激情推动，需要理性从事。”这句话也在一直鼓励着我们的团队。

（三）专业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是机构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机构 9 名理事有 7 名是汶川本地的骨干力量；服务队伍 11 人中有 9 人是川籍人士，7 人为汶川人。注重本土化既有利于服务的开展，也有利于机构的长效发展。

三、挑战

1.像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因为环境的艰苦，我机构难。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以吸引众多优秀专业人才到机构长期工作，因为着眼于培养本土社工力量势必在短期内一定程度降低用人

标准，给人才队伍建设带来一定压力。

2.我机构因属新生社会组织，社会影响力尚有限，社会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利用以及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在获得社会支持方面需不断努力。

3.因路途遥远，广东的专业督导直接亲临现场指导社工开展服务存在一定限制等。

四、下一步工作重点

机构的发展任重道远。今后，我们将继续在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紧紧围绕汶川建设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下一步工作重点是：

1.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协助政府开展基层服务工作，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品质，促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改革与创新。

2.加强专业学习，进一步探索本土社工人才队伍、机构持续发展模式。

3.立足汶川新家园建设和民众需要，进一步准确定位服务项目和内容，更好地打造服务品牌和亮点，为汶川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4.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为汶川民众提升更好的多元化的服务与支持。

我们希望将机构建设成为优秀的灾区社会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在灾区社会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的组织建设、服务开展、科学研究方面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我们相信，在国家民政部、广东援建工作组、县委县政府、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共同支持下，

机构将会迈上一个新台阶，为和谐汶川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二零一一年四月

乐施会对汶川地震的紧急人道救援

本篇摘自《5.12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乐施会积极与灾区的各级政府、民间机构和受灾群众密切合作，迅速实施了乐施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接实施的紧急救援工作。由于乐施会当时在四川并没有

项目团队，因此决定即时从昆明、北京、香港、贵阳和兰州等办公室抽调同事到四川灾区参加救援工作，包括项目、传播和财务行政同事都参与救灾，并招聘当地熟悉情况的志愿者参与紧急救援，而兰州项目办则负责对甘肃和陕西灾区的救援工作。地震发生两天内，乐施会分别与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国务院扶贫办、四川省民政厅、扶贫办和甘肃省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在此次救援行动中，乐施会通过和省、市、县级政府建立初步合作机制，承诺乐施会的响应机制。在救灾过程中，乐施会先后与四川省扶贫办公室、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林业厅、红十字会、计生协会、陇南市委办公室、武都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文县扶贫办等政府部门不断沟通协调，确保政府部门对乐施会在四川、甘肃地区紧急救援行动的积极支持，保障了机构的工作理念贯穿始终，增进了乐施会与甘肃当地政府的的关系，为下一步与各级政府合作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紧急救援阶段，乐施会先后约有 60 名员工直接参与救援行动、物资采购和传播工作。整个中国部的救灾工作由中国部总监担任总统筹。中国部总监和项目团队根据灾区实际情况与有关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讨论后，作出具体救援和重建的策略、资源分配及实施计划。为加快项目审批和实施速度，乐施会改变以往由合作伙伴提交项目建议书并实施项目的做法，在四川灾区由乐施会团队直接管理和实施大规模的救援物资采购、运输和发放。在甘肃和陕西灾区则由乐施会团队与当地民间机构共同管理和实施救援项目。为此，乐施会制订了紧急救援物资的集体询价和采购决策机制，确保救援物资采购的公开透明

问责。除政府部门外，乐施会在四川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国际小母牛组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等多家民间组织合作，了解和评估灾区需求。在甘肃和陕西，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和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等当地民间组织提供有经验的项目人员和志愿者，进行项目评估和物资运输发放，甘肃省红十字会协调陇南市政府关系，陇南志愿者协会积极协调武都区政府，这些资源的投入促使项目能快速有效的实施。除派发灾民所需的赈灾物资外，乐施会也同时在灾区开展了公共卫生和心理辅导的项目。

赈灾现场物资发放的基本原则包括社区参与及关注弱势群体和妇女的利益等。并尽一切可能，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把救援物资直接运送和派发到受灾社区，以加快救援效率和减少物资中转所产生的损耗。

在 5.12 地震救援行动中，乐施会特别考虑了妇女和弱势人群的需求和利益，在甘肃灾区和陕西灾区发放了卫生巾、花露水（驱蚊止痒用）等用品。陕西宁强县水观音村的女性村民表示，“你们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太让人感动了”。甘肃的受访妇女认为，针对妇女的物资不仅仅解决了她们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让她们觉得自己没有被抛弃。另外，乐施会在四川青川灾区的穆斯林村庄发放救援物资时，也特别尊重村民的宗教文化，采购和发放了符合穆斯林要求清真食品。

乐施会 5-12 汶川地震的紧急人道救援从 2008 年 5 月开始一直开展到 2008 年的冬季，到 2009 年 3 月才正式完成，乐施会在上述时期救援行动中支持了 17 个项目，投入超过 2500 万元港币，3 个省 125

个受灾社区中超过 63 万人次受益。传染病控制及预防：2008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乐施会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派出 260 名专业医护人员志愿前往绵阳、北川、都江堰、彭州、绵竹、安县、什邡等灾区进行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同时向都江堰紫坪铺帐篷小学师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建造临时学校：2008 年 6 月至 7 月，乐施会动用超过港币 400 万元，与四川省教育基金会、理县及茂县教育局合作，在地震发生 2 个月内迅速建造了 7 所具有防震功能的“临时学校”，在重建过渡时期为超过 3, 000 名学生提供安全的上课环境。

除了 5.12 地震的紧急救援外，在过去五年间，乐施会在灾区开展重建工作同时，也曾多次回应 5.12 灾区内发生的其它灾情，包括：在 2009 年：实施了陕西宁强县安乐河乡唐家河村 7.15 强暴雨救援、四川青川县石坝乡 7.16 特大洪灾救援项目、援助安县千佛村 7.17 泥石流影响村项目、甘肃康县特大暴洪灾害救援项目。在 2011 年：四川南江县 7.6 暴雨灾害紧急援助、7 月陕西宁强县广坪镇暴雨紧急救援、9 月四川巴中市水灾紧急援助。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本篇摘自《5. 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今天 6 月 2 日，是汶川大地震发生整整 3 个星期了。在晚上 9 点。坐在成都往北京的航班上，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我知道我的心已和被大地震摧残的灾民和大地紧紧连在一起。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善于也不想煽情的人。也总在提醒自己，面对悲剧，我们的澎湃感情

是无法挽回遇难者的宝贵生命。更知道，每一个中国人，在 5 月 12 日之后，已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每个人心中的哀情和悲痛。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在我正在暂离开灾区的时候，用我笨拙的笔来，和灾区一起开展救援 10 多天的同事们分享一下我的点滴零乱的感受。在过去的日子里，无论在电视中看到大批的人们在地震中失掉家人，或者眼看活生生的生命在地震的废墟中无法抢救而消失，多年未曾流过泪的我，总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我来到绵竹的九龙学校和五福富新学校、都江堰的聚源学校、安县的秀水学校时，看到在地震中大批和我的儿子同龄的学生，鲜花一般的生命在刹那间被永远抹去。甚至时至今日，他们中的一些遗体还埋在废墟残骸中，伴随他们短暂的生灵只有满地的破烂的课本和书包，和他们父母绝望破碎的心。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害，任何人所作的挽回损失努力都如同杯水车薪。尽管我们的紧急救援行动不可能挽回已逝去的生灵，但我们所有参加救援工作的同事都相信，至少还可以给生还者送去一丝爱意和关怀，救援物质也或多或少还可以帮幸存者度过短暂的温饱难关。

正因如此，所有参加赈灾救援的同事们，包括预算审批、物资需求评估、询价采购、运输物流、物资派发、筹款传播等团队，在面对种种困难和千变万化的形势，在余震不断的灾区齐心协力地工作，在短短的两个多星期中，把 500 多吨的各种救援物资尽快地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中。受益人数超过 10 万人。覆盖了除北川之外的所有主要灾区，包括绵竹、青川、茂县、汶川、都江堰、文县、安县、什邡和彭

州等。本次紧急救援行动的困难之大，规模之巨，地域之广，受益人数之多，团队配合之默契，都是乐施会 30 年之冠。

这次大地震对灾区人民造成的损失相信在未来 10 年都无法补回。勤劳的灾区群众已正从灾难阴影中慢慢恢复，开始生产自救。有些学校也开始复课。我们在继续赈灾救援活动的同时，也要开始灾后重建了。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很高兴看到我们第一个活动板房学校重建进展顺利，再有几天就可以让彭州灾区的小学生们复课了。

只要看到儿童，便可以看到重生的曙光。寄希望于我们未来的重建可以贡献于灾区的重生，可以慰藉废墟残骸下的生灵。祝大家救援工作安全开展。保重。

期待着早日回到灾区和大家再并肩工作。

乐施会中国项目总监

廖洪涛

给 5·12 地震灾区四川省的慰问信

本篇摘自《5.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我们是贵州石门坎，乐施会扶助了多年的极贫社区，在你们灾害和困难出现的时刻，社区的男女老少在一起，自发为你们捐款，最老的有 70 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有几岁的孩子，并通过社区会议决定，把社区内发展基金的积累也捐出了一部分，我们很贫穷，钱不多，但不管三元两元是大家的一片心，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

和勇气，我们愿意与你们一同走过困难、克服灾难！

多年来我们得到外界的援助，那是大家的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有困难别人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年冬天我们受了雪灾，得到来自政府、民间的多方救助，我们感受到外来的温暖。现在你们遇到不幸，我们要伸手，把我们的爱心传递过来，大家一起度过难关。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战胜困难！

感谢乐施会的朋友们！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带到，把我们捐的 2 万多元钱用在最急需帮助的你们身上。

贵州省石门坎七社区全体村民

2008 年 5 月

灾后重建

本篇摘自《5. 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乐施会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实施时间是 2008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总共 5 年，分两个阶段进行。五年灾后重建的总目标为：“通过与政府和本土民间组织、高校及受灾社区合作，应用参与式的项目管理模式，帮助目标社区的受灾群众恢复正常生活，基本恢复到灾前生计水平，提高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防灾、及自我组织能力。”重建项目集中在被受外界重建援助忽略的贫困农村，乐施会不在资源比较集中

的城镇开展重建,原则上也不涉及永久性住房、医疗卫生设施等项目;这些项目都已经有大量资金投入,而学校重建亦只限于在甘肃偏远农村的小规模教学点或村小重建。

第一阶段的重建是 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3 月, 以与国务院扶贫办系统合作的项目为主体, 重点是尽快让受灾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因此项目内容以重建小基建占多。2009 年 1 月, 乐施会与国务院扶贫办〔国扶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签订《开展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试点项目框架协议》, 是国扶办继 UNDP 之后再次与国际民间机构合作的灾后重建试点。扶贫办系统与乐施会合作的试点意义有三点: (1) 弥补国家对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资金不足 (2) 引进、学习国际上发展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实施理念 (3) 探索重建的创新模式。

在这框架协议下, 乐施会在 80 个受灾村中 (四川 40 个, 甘肃及陕西 40 个) 各投入 100 万元重建资金, 扶贫办则在每个村配套 50 万元。换句话说, 乐施会在这个框架协议中投入的重建资金超过 8, 000 万元, 占重建资金的七成, 是乐施会汶川地震重建中最主要的项目框架。

第二阶段是 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9 月, 为期两年半, 以农村灾区的生计恢复及能力建设为重点, 在制订第二阶段的重建规划时, 乐施会考虑到下列几个灾区实况:

灾区的重建项目大部分集中在硬件的建设, 缺乏软件的建设。

刚完成重建的新社区中有很多社区问题逐渐浮现, 如社区关系、

灾民的债务、缺乏生计策略和社区服务等。

很多地震后的灾区需要灾害风险控制的培训。

很多新涌现出来的参与灾后重建的民间机构需要能力提高

因此，乐施会的第二阶段重建，除扶贫办之外，也增加与当地民间机构的合作，项目类型集中在六方面：灾后生计恢复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减灾、经验总结和政策倡导，本土 NGO 培养、探索性新项目。其中以农村生计恢复发展和防灾减灾为主要领域。

四川省灾后重建资源分配在四方面：总预算的 60% 用于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修缮项目；总预算的 30% 用于生产生计恢复，包括种养殖业和重建期间的救援投入；5% 用于社区及伙伴能力建设；5% 用于乐施会在四川的备灾中心以储备紧急救援所需物资，如棉被、卫生包等。在四川，乐施会投放重建资金共计 7100 万元港币，覆盖四川省内 28 个重灾县的 80 个贫困农村灾后重建社区，项目惠及直接受益贫困地区受灾人口超过 11 万人。项目以小基建的修缮为主，项目新建约 180 公里村路、新建 33 公里人饮灌溉水渠及修缮维护、山坪塘修建维护、以及结合部分产业发展项目（如种植魔芋、核桃、养殖土鸡、补贴农户修缮猪舍等）共同实施。

乐施会与四川扶贫办以及民间组织合作的重建项目，特别关注受灾地区的贫困人群、妇女、少数民族、儿童、孤儿和老人。在实施的项目中，大部分工作由社区成员自行管理和执行。这样不单增强了社区成员对项目的拥有感，又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更好地保证项目的成功和持续性，也加强了村民与地方政方的关系，同时提高社区成员

的项目管理能力。不少小基建项目因为有村民的有效监通和投工投劳，节约了项目的整体成本，令社区可以把节约了资金扩大项目规模，发挥更大效果。

天池村的堰塘修复

本篇摘自《5. 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天池村号称青神县的“小西藏”，海拔全县第一、条件也是最差，全村的残疾人占乡里比例最高。汶川地震后，乐施会支持青神县妇女促进发展协会在天池村实际综合生计发展项目。通过与促进会一起规划项目，结合村民需求修复了村内被地震损毁的水塘，并发展种植雷竹的产业项目来扶持社区生计。杨大姐是社区开会选出来的项目监督小组的一员，她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到施工现场看着，量量厚度，看看修的好不好，漏不漏水，“没想到守了 2 个月下来，还节约出了 1 万

多块钱”。向乐施会说明情况后，申请将结余下来的钱又多修了一口堰，满足了 80 余亩田地的灌溉需求。堰塘完成后，实地验收中当地水务局的工程师和其他村民都对塘的质量赞不绝口。“往年春旱还要到几里地外挑水，今年应该不用了”村民开心的说。

四川绵阳市安县的山区，有一个风景美丽的村子一千佛村，大地震后千佛山山体松垮，雨季泥石流频发，给社区农户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村上 9 组的村民黄倩妹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给家里养的土鸡准备草料，自己一家的经济收入就靠这十几只鸡长大了下蛋来支撑了。“以前村子里全是泥巴路，地震后乐施会来了，把水泥路打起来了”，村里的路方便了，但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只能种山区的几分薄土，“以前生病都看不起，现在养鸡有了收入，卖了钱娃娃读书用，还可以医病。”黄倩妹看着栏里追逐着的鸡，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地震后乐施会和伙伴千佛山自然保护区一起调研规划项目，支持了社区贫困户发展土鸡养殖项目，在灾害不断的贫困社区为帮扶贫困家庭改善生计、增加收入实现了雪中送炭。

志愿者探访感受

香港志愿者考察团成员黄婉晴：“要真正做到助人自助并不容易，但经过我们身体力行的现场考察，发现乐施会的确能做到。推展的项目由村民集体讨论和决定，乐施会则从旁监督和协助，尽量减少对项目的介入，令项目能针对村民所需，也许项目不能令他们富起来，但至少保障了他们的温饱，也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因为一分一毫一颗米，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赚回来的。”

工作原则和理念

本篇摘自《5. 12 汶川地震五周年乐施会工作报告》

乐施会在汶川地震的紧急人道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都严格遵守下列守则及标准：按照“国际民间机构紧急人道救援中的行为守则 **NGO Code of Conduct in Disaster Relief**”以及“环球计划 **Sphere Project2** ”所订立的标准实施项目。

把有限资源集中于偏远的、贫困的、受灾严重的但较少媒体报导和缺少重建资金的农村社区。

以帮助受灾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为工作目标。

项目过程中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灾区中的弱势群体）可以参与其中，包括讨论及决定项目的内容，以保证项目能响应灾民需

要。

社会性别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项目中得到关注。

尽可能与地方政府及当地的民间机构合作，并透过培训，增强伙伴实施项目的能力。

确保项目的透明度，以达到对公众及项目社区的问责员工工作感受。

成都办项目同事朱同景：“在四川 5-12 地震灾区工作，目睹灾区并共同经历涅槃重生的 5 年时间，是目前人生轨迹中最精彩的一段。这段难忘的经历让我品尝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咸，体会了与死亡亲密接触特有的压迫感、病痛相约的煎熬、耳目不及的焦虑、还有柳暗花明的因缘。5 年的重建工作历练了我，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少了一些浮躁，珍惜生命和自由、更加珍视爱的羁绊。感谢与我共同勾勒这段生命轨迹的所有人。忘不了淳朴的乡亲，亲密的伙伴，还有我们并肩在灾区工作的可爱的同事们，我会更加努力。”

兰州办项目同事于华梅：“汶川地震发生后，作为乐施会的项目人员，我先后参与了甘肃的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亲眼目睹了地震发生后甘肃灾区的第一现场，亲历了灾区重建过程中的变化。兰州办同事们走遍了甘肃陇南各个受灾县，开展了多个灾后重建项目，尽管遇到许多困难和压力，但是当我们把救援物资第一时间送到灾民手中，当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经过多方的努力恢复了正常，我们心中获得的是极大的满足和希望。”

长青文献图书馆 512 汶川地震相关书单

资料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微卓越-汶川地震伤残者的记录与反思	陶传进, 马玉洁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NGO 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研究	韩俊魁	北京大学出版社
NGO 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	张强, 余晓敏	北京大学出版社
NGO 参与汶川地震过渡安置研究	郭虹, 庄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多难兴邦-汶川地震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萧延中, 谈火生, 唐海华, 杨占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行动·合作-汶川地震中 NGO 参与个案研究	朱健刚, 王超, 胡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汶川地震公民行动报告-紧急救援中的 NGO	王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实施社会影响评估	黄承伟, 彭善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志愿者团队在行动-在汶川地震灾区的公益服务案例	张雪梅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组织响应自然灾害研究-以 2008 年以来重特大地震灾害为主线	韩俊魁， 赵小平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爱呵护 众人的力量-中国扶贫基金 会汶川地震救灾纪实	中国扶贫基金 会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公益文化与汶川地震后的社区重建	郭虹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机构简介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简称“基业长青”）负责协调整合资源，落实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相关的行业交流、能力建设、研究支持、传播倡导等工作开展。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英文名称 China Foundation Forum，简称基金会论坛，CFF）是有志于追求机构卓越、行业发展的基金会自愿发起的行业平台。2008年，在当时的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指导下，八家机构发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年转型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长青文献图书馆由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2019年发起的“基金会档案馆”项目而来，以记录、传承和传播中国民间公益为宗旨，目前开展记录保存、研究支持、文化交流等工作。

作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综合文献图书馆，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鄂尔多斯聚祥公益基金会和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等伙伴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不断发展，为中国公益慈善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播保存重要资料，致力于成为公益慈善领域新的重要基础设施。



关注基金会论坛



关注长青文献图书馆



支持长青文献图书馆